

§ 外国史研究 §

近代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文化牵引作用

许洁明, 秦元旭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 近代英国社会由高度分层的五分层等级社会向三层式社会结构变迁, 又从三层制塔型结构向中间不断膨大、分层越加细密、难以阶级属性描述的梨性结构变迁。在这个流动与变化的过程中, 社会分层的相对性、模糊性、互动性和变化性最为本质。社会上层引领、各阶层参与建构的文化认同新要素, 起到了整合分层利益、固着分层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它表现为精英向下吸取各阶层价值观念, 全社会向上看齐精英传统理念, 从而共同铸就近代英国“绅士文化”, 在分层结构变迁中文化的牵引作用成为稳定和谐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 近代英国; 结构变迁; 文化牵引

中图分类号: K561.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2) 03-0025-07

近代英国社会经历了从17世纪高度分层的农业社会向18世纪三层式工业社会的变迁,^① 又进一步从三层式塔型结构向19世纪两大阶级对立表象下, 社会上层不断缩小、中间阶层不断膨胀, 亚分层越来越细密的梨性社会结构过渡。在历经两个多世纪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中, 英国社会呈现一种极少革命和动荡、充满改革与创新的形态。为什么近代英国社会在结构变迁中能够平稳过渡、和谐发展而减少流血牺牲与动荡不宁呢? 这大概与结构变迁时期的分层特征有关, 更与变迁过程中的共同体文化特质及其牵引作用密不可分。

一、近代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分层特征

近代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第一个特征是社会各分层大多呈开放性和流动性。开放是流动的前提, 流动是开放的表现及结果, 两者相辅相成。所谓社会流动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空间中由某个位置向其他位置的移动, 既表现为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化, 也表现为群体社会角色的转换, 以及

因之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它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垂直流动又有向上和向下的区分, 指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社会层面之间位置的升降, 不仅涉及个人或群体社会地位的变化, 也促使分层结构发生变化。水平流动不一定改变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 但它可以改变人力资源在地域、行业或职业间的配置。近代英国社会流动主要体现在个人或群体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 以及人们在不同地域和同等地位的行业或职业间的水平流动。在五层式和三层式社会结构中, 贵族都居于塔型结构的顶端, 其开放性和流动性主要体现在单向度的向下流动, 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士向贵族阶层的攀升不容易实现。英国社会上层严格遵守长子继承制, 贵族后代中能够继承爵位和家业的只在少数, 其他子女大多进入教会、政界、法律等领域, 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向下流动的趋势。^② 然而, 近代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中最重要的现象是庞大中间阶层的形成, 它包括普通骑士、从骑士、缙绅等传统地方社会的中坚, 以及商人、律师、医生、教师等专业人士。社会结构

^① 许洁明 《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第36-37页。

^② J. V. Beckett, *The Aristocracy in England, 1660-1914*,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 102.

作者简介: 许洁明(1950-)女, 江苏新沂人,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秦元旭(1970-)男, 山东临沂人,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变迁时其分层结构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在这里尤为突出,因为中间阶层其多向度的开放面对全社会而言,各个阶层中都有一部分人向塔型结构的中间层面聚拢,呈现出上层不断缩小、中间阶层在人口数量和财富占有方面都不断增长,社会形态逐渐呈现为梨型结构的转变。约瑟·马西在1760年统计,贵族家庭包括大乡绅占英国家庭总数的1.2%,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4.3%,中等阶层分别为58.8%和74.4%,下层为40%和11.3%。可见在18世纪中叶中等阶层的力量已经相当可观,顶层贵族之外社会各阶层的开放与流动至少呈双向性,上层和中间层向下流动也屡见不鲜,下层向下流动则触底而成为了赤贫的“无产者”。

近代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第二特征是分层间的互动性和冲突性。互动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指各分层之间并非完全隔离,而是彼此关联甚至有时为同一目标联合行动;二指分层之间互相影响甚至形成连锁反应,一个等级的变化往往牵一动百地导致其他等级发生相应变化。英国社会从来不由完全排他的等级构成,例如英国骑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等级,而分为社会属性和文化观念附着于贵族并成为其基底部分的上等骑士,以及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近乎中产阶级的普通骑士。^①在英国中间阶层和社会上层密切联系、互为补充。笛福在18世纪初写到:在英国商业虽然同绅士地位绝不相容,但却创造了绅士,一两代以后商人的儿子、至少是孙子,会变成和世家大族出生的贵族子弟同样好的议员、枢密院顾问、法官、主教等社会精英。这种互动性使社会分层结构呈现为千姿百态的动态变化,尤其是近代早期“乡绅的兴起”对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乡绅主要指社会地位在爵位贵族之下、普通民众之上的土地为生计的人群。1688年格雷格利·金统计,在英格兰属于乡绅的大约有16400家,其中从男爵800家、骑士600家、从骑士3000家、绅士12000家。^②18世纪中叶的一位学者则估算为18000家左右,19世纪初的学者估计为26890户。^③

到18世纪,英国三层式社会结构的组合相对固着,财富逐渐成为划分阶层的主要依据。这时,虽然土地不再是确定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但它仍然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本,贵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方面仍占支配地位,所以历史学家把18世纪称为“贵族的世纪”。然而,在这个世纪中中间阶层数量扩大、财富增长,形成了以自由、责任和进取为主的意识形态,并开始谋取政治权力和文化霸权。同时,以工商业资产者为核心的中间阶层残酷地剥削社会下层人民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因此,阶层间本来就隐在的冲突性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中间阶层开展激进运动:成立政治团体、举行游行集会、创办激进刊物,抨击腐败制度和要求进行改革,形成了一股挑战社会上层的政治势力:1776年部分厂主联合迫使议会撤消《印花税法》。下层人民也开展激进的维权运动:谷物骚乱、反对贫困、抗议圈地和抵制工厂制度,向社会的中上层的权威进行挑战:1740年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发生粮食骚乱,“大量矿工和矿车工、铁匠和其他普通工人沿着桥走过来,……举着手杖,打着旗帜,……挤满了城市主要街道。治安法官在市政厅开会,不知所措”;^④1766年霍尼顿饰带工人从农场主的仓库夺取谷物,伯克郡纽伯里地区的贫民对粮价过高不满,到市场上撕开粮袋、撒掉谷物;1767年兰开郡农民为抗议圈围沼泽而掀起骚乱。这些就是社会结构变迁中与分层流动同时存在的冲突。

模糊性是近代英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中的又一个特征。人们在社会分层间流动的频繁造成了分层界限的模糊,当社会的亚分层越趋细密,模糊状态越是加剧,以至于人们很难界定自己或者他人所处的分层状态。这时,对社会进行分层更多地成为研究的需要,而现实社会中对其地位始终处于变化中的一些个人与群体很难认定其阶层属性。社会流动是一个时时存在的漫长过程,人们的地位转换不可一蹴而就,这也造成了相邻等级之间不仅界限模糊,有时还出现亚分层边沿叠盖的现象。例如对英国贵族做出统一界定就十分

① J. C. D. Clark, *English Society, 1660-18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97.

② Peter Mathias, *The First Industrial Nati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London 1983, p. 24.

③ 徐浩《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④ E. P. 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困难: 有学者认为贵族仅指有爵位的上院世袭贵族, 另一些则认为贵族应该包括从男爵、骑士、缙绅等等。戴维·罗伯逊说“在农夫和贵族之间, 一个集团和另一个集团毗邻而立, 他们以令人感叹的方式在上、下两个集团之间的夹缝中生存, 这样便合成了一幅具有内聚力的有力而美妙的图画。”^① 哈里逊在《英国纪实》中说“绅士是那些有高贵血统或者说至少是德行卓著而被封为贵族者。”同样是他在另一处又说“绅士分作两类: 男爵或拥有地产的贵族, 包括男爵及男爵以上者; 以及那些非贵族的人士, 如骑士、缙绅、纯粹的绅士”。^② 其叙述的混乱正是社会结构变迁中等级分层模糊性在时人思想上的反映。

二、近代英国文化认同的新要素

那么, 在这种具有开放性、流动性、互动性、冲突性和模糊性的分层结构变迁中, 是什么作为一种整合力量使各个分层聚焦于英国社会的整体发展? 是什么化解了因分层利益的冲突、分层互动的摩擦、分层流动的对抗所导致的动荡不宁? 是什么使近代英国呈现为鲜有革命而多行改革、少有冲突而多具妥协的发展形态? 在社会各阶层的聚焦中文化的牵引起到怎样的作用? 这里不得不涉及近代英国文化认同中新要素的形成。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 面对不断变迁的社会, 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需要寻找一种共同文化认同, 以便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获得归属、增加自信、取得利益。文化认同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群的自我确认, 以及他们与具有其他文化特征之人群的相互区别, 是一种群体的主观感知、个体的被动影响。在这里近代英国文化认同新要素主要指精神文化方面的共象趋认。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是最有意义的东西, 是人们在共同体中通过长期生活体验, 对共同体最重要之价值观念的肯定性体认, 核心是对共同体基本价值的认知、确信、聚敛与心理趋向, 是凝聚共同体的基本纽带及使其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 在社会急剧变化与发展时期构成共同体维系和发展的重要的

深层基础, 其千丝万缕的固着力量与牵引作用很难体察却无所不在。在共同体文化基质即既有文化认同不发生大变化的前提下, 与时俱进之新要素的形成与扩散时时存在, 尤其是在近代英国社会结构变迁显著的时期。这里以宗教改革后的认同意识和近代绅士文化的建构为例加以剖析。

宗教是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 它包含了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初识, 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认同多维要素之一的宗教认同, 指具有相同宗教特征之人群的一种自我认定, 以及他们和与其他宗教特征之人群的排他性识别。在宗教形成为一种共同信仰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后, 宗教信仰上的趋同容易形成社会最牢固的文化整合力量。霍布斯鲍姆指出“因为宗教原本就是人类用来团结力量、交流心灵的最古老的组织之一。通过共同的仪式和兄弟之情, 宗教便可以将完全没有共同性的人群集结在一起。”^③ 在人类历史上, 宗教认同经常成为共同体认同的最为深厚的基质, 产生增强共同体凝聚力的作用。“集体文化认同有扩散性和持久性的倾向, 不易于迅速变化, 而易于更加强化和牢固。即便在绝大多数成员不再领略到集体认同的力量时也如此。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尤其如此”。^④

近代以来, 英国人的宗教认同与其民族国家的利益相结合而为共同体的发展服务。16世纪宗教改革后, 英国人普遍信仰基督教新教安立甘宗。但是安立甘宗保留了主教制等天主教设置, 在观念与仪式上不那么“净化”, 引起清教主义的强烈反对, 17世纪中叶一度演变为清教主义与安立甘宗的冲突, 而清教主义又分为长老会派和独立派, 英国社会的宗教文化在走向多元化。从根本上说, 都铎王朝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女王三代明君推行反天主教控制的改革, 目的在于使英国走上独立发展本民族宗教认同的道路, 使英国教会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而民族化, 其间尽管出现过玛丽女王复辟天主教的曲折, 但是延绵数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及其后的文化整合, 走的

① Harold Perk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85, p. 22.

② 威廉·哈里逊《英国纪实》,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68年, 第113、120、115页。

③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1789-1848》, 王章辉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87页。

④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Idea of European Un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 1, 1992.

是英国人独特的中间道路,没有出现德意志初闯采尔起义和三十年战争那样的动乱,也没有类似法国圣巴托罗缪大惨案和胡格鲁教徒大撤离的现象。斯图亚特王朝诸君断断续续复辟天主教的举措,被1688年“光荣革命”确立新教国王的顺序继位而解决。18世纪的一系列宗教宽容法案进一步使一度处于对立面的不服从国教者多多少少得到了宽释。可见,近代英国宗教认同的重构通过16世纪宗教改革、17世纪英国革命、18世纪宗教宽容法案等,一系列的改革、革命和立法不同程度地作用于社会,既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牵引着民族文化观念的趋同。同时,宗教改革取缔修道院、没收教会地产、打击宗教贵族,使乡绅阶层在购买教会地产的基础上得以崛起,清教主义提倡勤勉节俭、进取向上、物欲伦理,推动了近代英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两者都加强了英国中间阶层力量的壮大。^①在体现为分层结构变化的社会变迁中,共同宗教文化的重构渗入了更多的中间阶层意识形态。它的牵引作用贯穿始终,既重塑了自己,又固着了结构。后者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很重要,因为文化影响的作用相对于物质世界的发展更具持久性、广泛性。正是近代文化认同的新要素成为英国社会牵拉、固着与凝聚的潜在因素。

文化认同新要素与时俱进的建构,除了宗教价值取向的重塑之外,近代英国最重要的变化是绅士文化的铸就。绅士文化是英国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概括,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各个阶层的价值观念,既包括贵族阶层的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新兴中产阶层的价值取向,还多多少少受到了下层文化的影响。^②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精神的外化,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形成的”。^③近代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分层特性,使人们能够采取包容态度主动吸取其他阶层的文化观念,既改造了自己阶层的文化观念,也对重构超越阶层

而趋向一致的共同体文化认同做出贡献,在阶层文化的互动中,熔铸了全民共享的绅士文化,在英国人标榜绅士风度的过程中,这种精神气质成为牵引社会各阶层向共同方向发展的纽带。

绅士文化的基质是贵族精神,英国贵族认为自己“天然长上”并“生而自由”。对于君主他们坚持君王不过“贵族第一人”和“国王在议会”的传统,对于社会他们视自己为天生长上、民众主人和民族主干。内忧外患时他们挺身而出,形势缓和时他们稳步发展。1688年“光荣革命”中的贵族作用即为明证。贵族精神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到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逐渐凝聚成全民族的共同特征,在近代它主要体现在倡导绅士风度、提倡爱国主义、接纳工业主义。^④绅士文化也包含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这就是重视创造能力、提倡进取精神、进行自我设计、坚持终身奋斗,并认为人的命运属自己把握,卑微之人靠奋斗起家,“中等阶级在推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日益重要”,^⑤在英国工业化中成为经济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并以其经济价值观念影响贵族阶层和社会下层。贵族阶层随之习得进取精神和企业观念,通过工商业活动获取财富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下层人士则通过自己努力改变经济困境而成为绅士一员。小说家理查逊1689年出生于乡村木匠家庭,完成中等教育后到伦敦一家印刷所学徒,最后做了股东娶了老板之女继承老板事业还兼写小说。^⑥工业革命中纺织工人、建筑工人成为工头并跻身老板大有人在,他们在完成向中产阶级流动的过程中,使自己阶层的价值观念也向上渗透,成为绅士文化内涵的一分子,这就是坚持信仰自由、崇尚社会公正、投身社会生活、接受主流文化、不做无谓牺牲。这种自尊自强的意识与尊崇政治妥协的传统,表现在英国工人阶级取和平请愿、共同协商等改良主义方法,通过国家与议会的渠道达到改变劳动报酬和生活水平的目标,其文化价值观念

① Roy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llen Lane, 1981, p. 197.

② 舒小昀《分化与整合: 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357页。

③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年, 第286页。

④ J.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56.

⑤ Coward Barry,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550-1750*, London, 1988, p. 35.

⑥ 舒小昀《分化与整合: 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 第325页。

为社会中上层包容与吸收。“自尊运动”^①就是英国社会下层主动以主流价值标准约束自己的表现,而19世纪宪章运动的和平请愿方式也体现了主流文化的牵引作用。那么,近代文化认同新要素是如何形成的呢?

三、近代英国文化认同新要素的铸就

上述近代英国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新要素的铸就,是文化双向渗透与相互影响的结果。首先,社会上层主动向下吸取各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念,在欧洲大陆贵族普遍走向衰落而英国贵族仍高居等级制塔型社会顶端的18世纪,他们保持了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霸权,与社会上层能够审时度势地吸收其他阶层的价值观念相关,这种吸收能力又与上文论证的特征密不可分。“18世纪的英国贵族不是一个封闭的阶层,它向任何获得进入贵族阶层所需地产的人开放,及时把他们吸收为统治阶级的成员”。^②它从来没有站到民众的对立面,“其统治的全部技巧是确保民众的信心并获得他们的支持”。^③为搞好与佃农的关系,伊丽莎白·蒙太奇和丈夫每年定期访问约克和诺森伯兰的佃户,1775年她先在阿索勒普庄园慰问两天,又匆匆赶往约克郡的庄园款待佃户及其妻儿,然后奔到纽卡斯尔丹顿庄园请矿工吃布丁和牛排。^④中下层价值观念对英国贵族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促进其经济观念的转变和工商业活动的参与,到18世纪在中产阶级经济观念与企业行为的习染下,英国贵族不再以经商为耻,反而乐于参与其中,所以恩格斯说英国贵族十分懂得金钱的价值。贵族的经济活动主要有:第一,大胆进行农业改良,试用新品种、采用轮种制、推广马耕法、培育良畜种。汤森致力于四圃轮作制试验,并因巧妙利用芜菁栽培技术改良土质而被称为“芜菁伯爵”;乔治三世在温莎建立试验农场,并化名“农夫乔治”在《农业年鉴》

著文宣传试验成果。^⑤第二,投身于地产上的矿业开采和交通建设。布里奇沃公爵修建了18世纪英国第一条运河,高尔伯爵提供借贷与地主和工业家齐心协力支持特伦特-墨西运河的修建,布里奇沃和高尔分别投资2000英镑,工业家塞缪尔出资3000英镑。^⑥第三,从伊丽莎白时代起最热衷于远洋贸易投资的是贵族,他们成为对外贸易股份公司的股东。P. J. 格罗斯莱在1772年《伦敦之行》中指出,贵族和商人的混合是英国财富的无尽源泉。第四,英国贵族从城市地产获得的收入成为其总收入中相当重要的部分。1732年贝德福德公爵的农业收入为3700英镑,1771年为8000英镑,这在家庭收入中只占1/4-1/3,而来自于工商业活动的收入在比例不断上升,其中不少与城市地产业密切相关。

与此同时,“向上流社会看齐”是英国文化价值观念的传统取向,也是在贵族文化引领和大众文化渗透的长期互动中形成的。贵族不仅是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是社会的楷模和人生的目标。民众习惯于将现存视作合理,向上等人看齐成为风尚。近代新兴工业家因袭这种价值取向,其先辈不是贵族也非富豪,没有光荣的族谱和大量的金钱,他们凭借进取精神和创新才能取得专利,依靠精明的算计和残酷的剥削成为新富,在财富占有上超越某些传统贵族,但是在文化影响方面却无法代之。为获取政治地位和文化霸权,工商业巨子利用财富,购买地产与爵位,与贵族联姻而提升门户和声望。他们屈就于贵族的优势,拼命挤进上流社会的行列:在城郊大建豪宅、在宅邸陈列古董,骑马打猎、放鹰养犬,为成为“绅士”而改变生活方式。^⑦巴斯从罗马时代就是贵族集聚的温泉重镇,在乔治时代倘若没有中产阶级的光顾它将有名无实,中产阶级不仅分担了巴斯温泉的维持费,也分享了贵族营造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上等阶层之时尚和习俗的模仿维系

① 自尊运动起源于卫斯理教派的宗教活动,基本精神倡导工人群众勤奋、节俭、学习知识、改进道德,步步升入社会较高层次,以获得社会的尊重。其组织基础是信仰安立甘教的劳动群众,不仅吸收了大量工人男性,还包括其家庭成员。自尊运动的终果是工人阶级被中产阶级价值观所同化。

② 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76, p. 26.

③ A. L. Rose, *The English Spirit: Essays i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London, 1946, p. 26.

④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⑤ 许洁明《殊途同归——近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兴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⑥ J. V. Beckett, *The Aristocracy in England, 1660-1914*, Basil Blackwell, 1986, p. 259.

⑦ 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26.

了闲暇娱乐业和奢侈品商业的活力。^① 在一个富裕的时代社会下层在消费方式上模仿上层人士成为时髦,他们购买钟表、书籍、陶器、巧克力和茶叶,服装消费也达到令人不解的地步,连游历不列颠的外国人对英格兰乡下人的穿着也惊讶不已,而且“尽管可能连一些生活必需品也没有,多数妇女还在饮茶”。^② 这种上行下效推动英国社会以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向前发展,在不知不觉中与时俱进地共同铸就了文化认同新要素。

四、社会分层结构变迁中的文化牵引作用

近代英国以其发展中的稳定而著称于世,没有出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那样的天翻地覆。对于英国社会自1688年后避免了政治革命与社会动荡,19世纪《经济学家》主编巴杰特用“顺从”理论加以解释。他认为这个民族是典型的顺从民族,智慧使人们信任精英,认为某些人发号施令其他人服从遵命这种理所当然的天命观使社会稳定发展得到延续。^③ 在这种遵从长上的观念中,巴杰特看到一种政治美德即妥协与共赢。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则持相反观点,他赞扬尊严而谴责屈从,认为从本质上看各阶层的英国人在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方面都是贵族化的,都有关于自由的构想,并以之作为共同体价值观念的基础,而平等观念在英国人看来是奇思怪想而自相矛盾,他们不喜欢很多人居于自己之上正如不喜欢很多人屈尊自己之下,因此英国人从不认同其他国家的政治民主和共和制度。巴杰特和穆勒从不同的角度道出了英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和谐稳定发展的文化原因。事实上,近代英国是一个由不同阶层建构的立体社会,在这个立体结构中各个阶层相互对抗又融合共赢,任何一个阶层都无法绝对地侵占其他阶层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立体结构中以上层社会价值观念为引领的主流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地发生变化,吸纳其他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在不断跟进中起到文化牵引的作用,既形成了相对的平衡,又维持了动态的稳定。

谈到文化的牵引作用,最典型的是英国的政治文化艺术,这就是各个阶层大都奉行与其战斗宁可妥协、与其革命不如改革的政治文化传统,有时它也被看作统治阶级政治才能的体现。^④ 在每一次重大危机面前,政治精英大都能够通过必要的让步而成功地消灾免祸。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1688年的“光荣革命”,1832年保守党为挽救其经济特权不得不同意议会改革以避免革命,1846年为保护其政治特权不得不接受废除《谷物法》,1867年为政党利益甚至提出较之于自由党更为激进的第二次议会改革方案。^⑤ 每当他们设法避免阶层利益冲突的升级,而引导政治事件朝向改革方向发展,以保持其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控制之时,妥协与共赢的共同体文化的牵引作用就得到体现。所以,除1640年革命之外大规模的动荡在近代英国不曾出现,原因在于具有开明保守主义的社会上层有足够的文化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充分利用了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牵引力,他们精通弹性防御并能巧妙利用妥协艺术与拖延战略,以让步、汲取和融合而保存自己政权的本质。这种分层间的既冲突又融合,使下层人民最为不满的时刻成为上层社会最克制的时候。^⑥ 18世纪30年代发生的反公路征税暴动以温和的办法得到处理;18世纪50至60年代发生的谷物骚乱以政府容忍态度得到解决;1765年伦敦斯皮塔菲尔德丝织工人因贝德福德勋爵支持法国丝绸进口而围攻其府邸,政府不得不出动军警,而伦敦上流社会没有视之洪水猛兽,反而打趣为“有趣的娱乐”,可见在共同文化牵引的情势下阶层的隔膜与冲突能够得到及时化解。

对于近代英国历史发展多延续而少断裂,社会分层结构的独特性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的牵引作用更是以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贯穿于这个立体社会结构,或多或少此时彼时地把变迁中的社会分层加以粘合、给予凝聚和提供催新。社会各分层既冲突又融合,互动中达到和谐,和谐

① 肯尼思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11页。

② A. F. Scott, *Everyone A witness, The Georgian Age, An Anthology*, London, 1970, p. 201.

③ Francois Bedarida, Translated by A. S. Forster,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51-1975*, Methuen, p. 75.

④ Francois Bedarida,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51-1975*, p. 76.

⑤ 许洁明《近代英国两次议会改革之比较》,《思想战线》,1994年第2期。

⑥ Kenneth O. Morgan, *The Oxford History of Brita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402.

中推进互动, 这种牢不可破的辩证关系与共同体文化牵引作用不可分割。各阶层有属于自身的意识形态, 但是阶层文化认同圈与更大更久更牢的共同体文化认同圈形成了同心圆的关系, 即便阶层文化认同圈之间互相碰撞, 但是能够对各阶层之共同需求提供保障的共同体文化认同仍然是核心、是引领。结果引领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任务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实现了从英国贵族独担向贵族与中产阶级共担的置换: 贵族的妥协及其经济观念的变异, 识时务的中产阶级“贵族化”使两者相互靠拢而不是相互斗争, 结果在英国历史上工党出现很晚。在这个分化、重组与固着的过程中, 中产阶级文化的向上渗透有助于改造根深蒂固的贵族文化, 从而形成民族共享而阶级属性模糊的“绅士文化”。在 18、19 世纪之交贵族通过改变自己继续稳据文化霸权时, 中产阶级在

上层和下层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接作用, 他们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最优部分。这个不断膨大的部分纳入了在工商业和专业技术领域营生的贵族子弟, 也吸收了从帮工学徒成长的工商业新星, 各阶层对自由权利、政治妥协、经济互利的认同, 推动其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渐进和谐中得以实现。总而言之, 近代英国经历了由五层级农业社会向三层式社会结构的变迁, 又进一步从塔型社会向稳固的梨性社会发展。这个过程中社会分层呈现的开放性、流动性、互动性、模糊性, 以及各阶层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寻求发展与渐进, 平稳地跟随着时代前进而避免了过度革命和较多动荡, 在互动与和谐中成为世界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这不能不说其共同体文化中的发展智慧和妥协艺术起到了牵引作用。

The Cultural Traction in Modern British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Xu Jieming, Qin Yuanxu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 Modern British social structure, to begin with, changes from a five-tier highly stratified hierarchical society to a three-tier one. Then it changes from a three-tier social structure like the shape of a tower to a pear-shaped one with its middle part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and its stratification getting thicker and thicker so that it can hardly be described as class proper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flow and change, the most essential is the relativity, ambiguity, interaction and variability of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new elements of cultural identity led by the social upper strata and constructed by all classes of people have effect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hierarchy interests and on the solidity of layered structure and on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It reflects that the elites absorb values from the other hierarchies, and the other social parts learn from the traditional aristocratic concepts, therefore the whole social hierarchy created the modern British gener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hange of the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the cultural traction has a crucial effect on the st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words: Modern Britain, structural change, cultural traction

(责任编辑: 黎原)